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刘半农

LIU BAN NONG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刘半农代表作

臧恩钰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哲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刘半农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7.75印张176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册

ISBN 7-5400-0024-4/I·23

统一书号：10385·153 定价：2.50元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面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刘半农1934年7月14日病逝，翌年与其胞弟刘天华葬于北京香山玉皇顶老爷庙，迄今已过半个世纪。然而，其墓地鲜为人知，谒者罕至。这里，姑且不谈刘半农作为语言学家的业绩，仅就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驱，斩将搴旗的先锋，或者仅就他筚路蓝缕开创新诗和杂文的功劳，就使我们感到他身后的荒凉了。

1917年1月和2月，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之后，刘半农便于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与之呼应，对胡、陈之议“绝端表示同意”，并提出了“破除旧韵，重造新韵”，以及提高小说和戏剧地位等主张。而后，又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应用文之教授》等文章。他鲜明而坚定的态度，积极而具体的主张，无疑对刚刚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年夏天，他以26岁、高中肄业的资历，由沪抵京，出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并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这时，他受新思潮的洗礼，毅然把笔名“伴依”改为“半农”，以表示他要从此开始新的文学生涯，不再从事那缠绵悱恻的旧文学创作的决心。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和《作揖主义》等杂文，扫荡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污泥浊水。而当他有感于新文化运动之初还

不够热烈的时候,1918年3月,他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在《新青年》上演出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双簧戏”,成为新文学史上的佳话。他的《复王敬轩书》一文,笔锋犀利,痛快淋漓地逐条批驳了封建卫道者的种种谬论,表现了可贵的战斗精神。著名诗人朱湘曾说到自己“皈依新文学”的原因,“是刘半农的那封《复王敬轩书》,把我完全赢到新文学这方面来了。”说它的“道理更为多些,笔端更为带有情感”,“有许多人,连我也在,便被说服了。”(《朱湘自传》)可见其影响作用之大。

刘半农不仅向封建旧道德、旧文学发起勇猛进攻,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热烈鼓吹者,而且他也曾亲自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1919年6月3日,当北大法科八名学生因散发爱国传单而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时,刘半农当即挺身而出,要求慰问被捕学生,并与别人联名在校刊上撰文声讨当局的罪行。6月11日,陈独秀也因散发传单在东安市场被捕,刘半农一边奔走营救,一边与李大同、胡适等人相呼应,在《新青年》上发表百行长诗《D——!》,向荷枪实弹的封建军阀展开了挑战。

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文学革命的进行,刘半农团结其他先行者,做了许多社会工作。从1918年春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两年多时间里,他与稍后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伟大旗手的鲁迅先生,通信十余封,走访近三十次,过从甚密。因而,当他后来走向颓唐的时候,鲁迅说到五四时期的刘半农,还赞扬“他跳出鸳鸯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花边文学·趋时与复古》)

刘半农出于其文学革命的饱满激情,他在进行舆论鼓动的同时,也率先示范地进行了新诗和杂文等方面的创作。刘半农是新诗开创时期早春的播种者。1918年1月,在《新青年》4卷1号

破天荒发表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九首白话诗中，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象》就显示了新诗的活力。他进行过各种诗体的创造性试验，成为我国早期白话自由诗的奠基人之一。他极为重视学习民歌，是我国现代搜集歌谣和用方言写民歌的先行者。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号开设了“随感录”专栏，他也是最早发表“随感录”的三位作者中的一个，他对现代杂文的开拓之功，也是不应被忽视的。

应该怎样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刘半农的历史作用呢？对此，以往不少当事者都曾发表过议论。“一说到‘五四’文学革命，除陈独秀、胡适外，当然是不会忘掉刘半农先生的。”（汪馥泉：《刘半农与五四文学革命》）陈康白在《刘半农先生》一文中说：“我们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史绩不去稽考则已，假如对年轻的爱好文艺者谈起新文学运动发端的史实的话，无论你是如何偏心的人，我想总落不了这位参加过几阵生死战的老将——刘半农先生。”刘半农自己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开头也说：“文学改良之议，既由胡君适之提倡之于前，复由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成之于后。不佞学识鄙陋，固亦为立志研究文学之一人。”后在致钱玄同的信中也曾说到自己。他把新文学譬成演戏，说“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并不讳言自己当时的重要角色。刘半农病逝后，胡适送的挽联上写道：“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张恨水在《哀刘半农先生》中说他“五四以来，乃与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等致力于文化之改革”，也都点明了他的先导者的地位。在魏建功为他所撰写的“行状”那郑重的文字里，说：“陈独秀先生创《新青年》杂志，倡导思想解放，促成文学革命；胡适先生实先发

难，钱玄同、周作人诸先生相继起应，而先生与焉。”（《国学季刊》4卷4期）再看看旧营垒中反对派的意见，“五四”前，《公言报》为发表林琴南《致蔡鹤卿太史书》所加的按语中，刘半农就在其点名道姓的攻击之列，这从反面也证明了刘半农当时是一员攻击旧文学的冲锋陷阵的大将。

刘半农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尽管角度和形式不同，与之相提并论的人物也不尽一致，但我们联系刘半农“五四”时期的业绩，不难看出，刘半农无愧为新文化运动屈指可数的先驱，文学革命开创时期拓荒开路的猛将。而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对“五四”时期的刘半农做出更明确更充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无非是受了极左思潮影响的结果。刘半农的后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激昂奋进，甚至有些颓唐消沉。这就容易使人们认为他是个不好不坏的历史人物。这种认识不利于表彰历史人物顺应时代潮流的闪光之处以昭示后人。

任何历史上的先进人物，都难以始终站在时代前头，毕生叱咤风云，一直呼啸前进的。刘半农也自有他平凡和曲折的经历。他1891年5月27日诞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城内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祖父早逝，祖母无子嗣。半农的父亲原是本家的乡下孩子，六七岁便受养母收养；半农的母亲原是他祖母拣回来的穷人家的弃婴，当童养媳养大的。半农六岁入塾，十一岁入其父所在的小学读书，十五岁离乡到常州府中学就读，学习成绩常列前茅。1911年武昌起义时因学校停闭而肄业。他曾投笔从戎，北赴清江到革命军中担任书牍翻译工作，后因不满于军队内的混乱现象而离去。

1912年春，他为找出路去上海开明剧社当编剧。次年，开始了他将近五年的“卖文为生”的写作生涯。他先后发表四十多篇小说，大都发表在比较注重社会意义和文学意味的杂志上。他与

包笑天、张恨水素有交游，也戏称自己是“红男绿女派”小说家，身上不乏“鸳鸯派”的才子气，他走上文坛的途中不能说没走过弯路。但他微寒的家境，艰辛的经历，以及本人富于进取的精神，使他的小说还一定程度地表现了对劳苦群众疾苦的同情，也具有些许的现实主义因素。当陈独秀主办的鼓吹科学民主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以后，他便立即摒弃了往日的小说创作，跳出鸳鸯派，毅然地追随《新青年》的方向，以至到五四时期呈现出横枪跃马的风姿，自然绝非偶然。可见，他是为寻找人生出路而又生活无着才“卖文为生”的。联想五四前不少作家在苦闷中摸索出路的情况，人们就不会特别苛求于他了。

五四时期过后，刘半农有感于“有人谓方从鸳鸯蝴蝶派文场中出来，焉得当教授”的刺激（王森然：《刘半农先生评传》），怀着“希望中国发达”的赤子之心，于1920年3月携妻小去英法留学，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学校。其间，因不能兼搞文学而专攻语言学。又因经费不支，留学生活非常清苦。但他勤勉自励，治学严谨，终于获得了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身在异邦，他写过充满爱国深情并广有影响的歌词，写过反駁国内资产阶级文人的文章，但更多的还是潜心于语言学研究 and 测音仪器的制作，其成果是显著的。

1926年秋学成回国后，刘半农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后兼辅仁大学教务长、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等职务。作为蜚声海内的现代语言学家，他的志趣主要在语言学方面。他初到北大时曾写作过《中国文法通论》一书，提倡新式标点，首创“她”、“牠”二字，还写过不少语言学论文；回国后他更孜孜不倦地热心于撰文著书，编写过《标准国音中小字典》、《中国文法讲话》等等。最后，也是为了编写《四声新谱》、《方音字典》而远赴绥

远等地调查方音民俗，不幸染病殉命的。

刘半农回国后并未放弃文学嗜好。他在《语丝》上撰文，为北洋军阀头子徐树铮毙命称快，抨击北洋军阀的御用文人陈西滢的丑恶嘴脸，揭露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任可澄的种种劣迹，作诗悼念“三一八”死难烈士等等。但总的说来，他已失去了五四时期高亢的格调，越到晚年就更为复杂一些。1932年以后，他写了《赛金花本事》之类无关宏旨的文章，也写了书赠友人、抒写琐事的八辑打油诗（名为《桐花芝豆室诗集》），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上发表了言不及义、晦涩无聊的因辑二十四篇《小品文》。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化战线上正进行“围剿”与反“围剿”殊死搏斗，而革命文化正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年代，刘半农“做打油诗，弄烂古文”。鲁迅对此表示“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1]还特别指明“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这说明刘半农这时已落后于汹涌前进的时代潮流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了可贵的晚节。他编选《初期白话诗稿》，选入旧友李大钊烈士的诗稿，强调这“诗稿就愈珍贵了”。还曾与别人一起倡议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和募捐。日寇入侵后，他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寇逃关以后，他曾愤慨地表示，国民党再不抵抗，“我就去投共产党！”他看周作人家挂上了太阳旗便过门而不入，回家后愤愤地说，“周作人再挂日本旗，我就和他划地绝交！”从此可见他晚年的民族气节和爱憎是非了。

刘半农虽然不像鲁迅那样越到后来越坚定越勇敢，成为民族英雄，但他又远非周作人那样投敌变节，沦为民族败类。刘半农只是在两军对峙的年代，作为先前的猛将脱离了剧烈的斗争火线，而迷恋于语言科研的王国，呈现为一度的颓唐，没能永葆五四时期的青春。但我们又怎能因此而勾销他在新文化史上的

显著贡献，无视他在新文化发轫时期的显赫地位呢？正像人们不能否定他五四时期打过几次大仗的战绩一样，人们也应该承认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先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员战将。

刘半农的新诗创作于五四时期和他留学英法的岁月。这正是我国新诗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即从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开始，到1925年“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形成之前这一阶段。这是我国现代诗歌的初创时期。刘半农作为新诗的开拓者，他虽不像胡适那样对新诗改革萦思更久，“白话”在前，却也对新诗的草创积极地制造了舆论。在诗歌形式是否得到解放关系到新诗能否创立和巩固的时候，他不仅呼吁“增多诗体”，而且首先身体力行，用他自谦的话说：“我在诗歌体裁上是最会翻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新诗的尝试期，许多诗缺乏形象，常常是概念的直陈。胡适曾自述他不是好诗人，“但开风气”而已，这时的刘半农则博得周作人的赞许，并被后来的评论者沈从文、苏雪林等人所首肯，足见刘半农在创作上确实为新诗的除旧布新显示了实绩，建树了功劳。他1926年出版的《扬鞭集》（上、中卷）和《瓦釜集》收集了他这时期的主要诗作，是我国新诗初创时期弥足珍贵的诗歌遗产。

刘半农的《扬鞭集》（上卷收1917至1920年的诗作，中卷收1921至1925年的诗作）开新诗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初创时期的新诗以反帝反封建，表现爱国主义，揭示人民疾苦等方面为其主流，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刘半农的新诗是伴随时代进行曲歌唱的。他有的诗痛斥封建军阀（《三月一十八》、《拟拟曲》），有的诗表达对祖国的眷恋和挚爱（《教我如何不想她》），但其

诗歌的主旋律是反映人民的疾苦，表现为诗人对人民苦难命运的关心。他的诗广泛取材于下层社会不幸的人民：被撵得无处栖身的卖萝卜人，备受苦难的学徒，赤胸挥汗打铁的铁匠，寂寞的老木匠，苦役的撑船人，无人问津的卖菜小贩，悲哀的牧羊儿，饥饿的穷家孩子，不得不当人家孩子奶妈的妇女，死难和挣扎中的洋车夫，不幸跨进耻辱之门的妓女，壮志难酬的化学家，以及初生而遭遗弃的婴儿，等等。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相隔一层纸》所描绘的不同命运人物的对比：屋子里是“分付开窗买水果”，怕让炉火烤坏了的“老爷”，屋子外是“咬紧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的“叫化子”。这样悬殊的境遇，并没有相隔遥远的时空，而是在同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薄纸！”诗人的写实主义诗歌就是这样面向现实，正视人生，描述了人民的苦难、不平和反抗意识，向旧社会发出了愤怒的控诉。虽然诗人还不是阶级论者，虽然他的诗缺乏五四时代高亢乐观的情调，但他同情人民，为人民的疾苦而申诉，却体现了时代精神，也发挥了历史作用。

《扬鞭集》中写景的笔墨极少，写意的诗却占有一定的比重。有的以状物形式写意（《落叶》），有的以寓言形式写意（《老牛》、《猫与狗》），有的结合抒情写意（《我们俩》、《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叙事形式写意的诗，如《晓》和《敲冰》。前者以车厢的拂晓和映着朝阳的女孩预示着历史的前进和未来的希望。后者以艰苦地打破坚冰，开凿航道，使船儿破冰前进并达到目的的描叙，预示了正义事业的成功必须要经过艰辛的历程。但此诗过多的重复，致使它拖沓冗长。这时期的诗人们普遍地没有掌握主客观相融合的表现方法，缺乏意象是当时诗歌的通病，这在刘半农的诗作中也有明显的反映。

《扬鞭集》的诗有它不断趋向成熟的轨迹。他最初所写的近于白居易新乐府的《游香山纪事诗》，是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相隔一层纸》、《学徒苦》中旧诗的烙印在逐渐减少。再后来，他的一些无韵自由诗和用方言写的诗，确实居于前者之上，尤以无韵自由诗影响更大。二、三十年代常常被各种选集和国文课本所选录的《一个小农家的暮》，于平淡中有声有色，是一首富有暗示和象征内涵的好诗。再如《在一家印度饭店里》，被赵景深称作压卷之作，认为这首诗艺术很完善，能在尺幅之中见千里。想象丰富，词语纯熟，全诗中没有一个不含诗意的字。另如《回声》，虽说不够精炼，但它所描绘出的空旷幽远的意境，荡漾着的淡淡的哀愁，确是诗意盎然。《教我如何不想她》因为是歌词，押韵，整饬，很有韵味。它吟唱游子思念故国的柔情，如同恋人的情意绵绵，至今还有感染力量。此外，还有一些略含哲理的小诗，惟感诗味欠浓，喻意也不够丰厚。他的这类白话自由诗在当时是风行于世，颇有盛名的。

《扬鞭集》的一部分诗是采用方言、民歌和儿歌形式创作的。《羊肉店》、《老木匠》和《小猪落地》就是“拟儿歌”之作，即用儿童的语言来表现儿童的心理和情趣。羊肉店所卖羊肚汤的美味，老木匠的辛劳、寂寞和爱抚之情，以及乡间残杀幼婴的恶习，都得到了特殊的表现。《雨》是当时绝无仅有的童话诗，写出了孩子对夜雨的感受，展开了童心的单纯和可爱。诗人还运用北京方言，以对话的形式写就了《面包与盐》和《拟拟曲》两首，诉说了当时一个苦力只能用面包和盐来养活自己的悲惨境遇；洋车夫的对话则反映了军阀统治给他们带来的苦难、惨死和所激起的反抗情绪。

民歌集《瓦釜集》是全部运用江阴方言和“四句头山歌”的

声调写成的。诗人自述他取名《瓦釜》是“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而要尽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面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一部分出来。”这动机很明确，就是要表现人民群众的声音。这些山歌，有劳动歌、女工歌，有农歌、渔歌、牧歌，也有情歌、悲谚和讽喻、滑稽的山歌。这些山歌和诗人回乡采集整理的《手攀杨柳望情哥词》，都有优美的意象，例如山歌的第十九歌：

河边渡阿姐你洗格啥衣裳？

你一泊一泊泊出情波万丈长！

我隔子绿沉沉格杨柳听你一记一记捣，

一记一记一齐捣捣我心上！

就写活了青年男子看（听）情人浣衣的情景和他亲切激动的心境，写出了主观感受和客观景物相契合的意象。苏雪林对此曾做过高度评价：“中国三千年文学史上拟民歌儿歌而能如此成功的，除了半农先生，我想还找不出第二人了吧？”刘半农所以在新诗的初创期做出这难能可贵的尝试和贡献，是他爱人民，爱人民的语言和口头民间文学，又肯眼睛向下刻意搜寻仿造的结果。但这类诗毕竟传布面不宽，影响也是有限的。直到新诗的第四个时期，民歌形式的叙事诗才蔚成风气，得到较大的发展。在这方面开了风气之先的也正是刘半农其人。

周作人说刘半农诗作的成功是得益于他能“驾御得住口语”，一语道出了他诗歌的最主要的特点。刘半农认为，“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他的诗的语言有自己的风格，模拟的方言有方言的韵味，模拟人物的语言也力求各有特色，表现了他独特的艺术功力。

刘半农作诗还有喜欢描写和叙事的特点，甚至还因而被称为

以白描手法作诗的大家。这对他的诗“进境很是明瞭”虽也不无益处，但又势必影响诗歌的抒情，从而减少了诗的感染人、激动人的力量；也会导致诗的内容平淡和缺乏底蕴。“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一种余香与回味。”（周作人：《扬鞭集·序》）刘半农的不少诗确实如此，不然，他的诗会诗意更浓，成就会更为可观。

刘半农在新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除了诗歌，就是杂文了。他的杂文创作的时间绵延得更为长久。从一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到他病逝之前，断断续续一直没有罢手。他的杂文大都收在他逝世前后出版的《半农杂文》第一册和《半农杂文二集》两本杂文集中。他的杂文集实在是杂，他自己说：“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曲；有傲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还有骂语；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半农杂文·自序》）其中论述语言学的文章占有一定的比重。仅就文学范围的杂文来说，其意义和价值也不可低估。

刘半农的杂文是他反对封建文化、封建军阀以及资产阶级文人而进行战斗的产物。当年，他风发的意气，昂扬的斗志，高亢热烈的激情，在他那封著名的信《奉答王敬轩先生》的嬉笑怒骂之中，都得到生动具体的展示。同期所作的《作揖主义》，展示了前清遗老、孔教会长、京官老爷等等的种种荒谬之论。从作者所采取的不屑与辩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其坚定的立场和必胜的信念。到五四退潮期，作者的思绪有些消沉了，认识也有些反复。1925年底，他得知“荆生”——北洋军阀头子徐树铮毙死的

消息，便欣然撰写了《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为徐树铮的应得下场称快，反映了他的政治方向和原则立场。与此前后，刘半农还发表了《徐志摩先生的耳朵》、《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来奚落“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徐志摩；也撰写《奉答陈通伯先生》，来反驳“现代评论派”的主要人物陈西滢。这些文章虽涉及个人龃龉，旨意不大，但反映了他与资产阶级文学派别代表人物显然不同的立场和格格不入的态度。到了晚年写《初期白话诗稿序》的时候，他已脱离了时代激流，但当他回顾起“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战斗，怀念起当年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仍是一往情深，字里行间充溢着战斗的情怀。

刘半农的杂文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挚爱。他在留学国外即将归国的通信中，就表达了游子思归的急切心情，没等动身就感到“心目中的故乡风物”近在眼前，在报纸上看到隆福寺、琉璃厂等地名就感到亲切而心向往之。当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日子，刘半农在《与张溥泉》信中直言指责民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写下了《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一文，虽然对于学生游行和民族挨打等问题自责过多，不无偏见，但他报仇雪恨的呼唤还是感人心肺的：“我们有枪就用枪，没有枪就用刀，没有刀可以用木棍，用树枝，用砖头，再没有，我们有头可以撞，有拳可以挥，有脚可以踢，有牙齿可以咬！”他对于那些只想变着法儿发财而毫无爱国心的北平商人，作《好聪明的北平商人！》，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抨击。他自剖了自己的心情：“现在的刘半农本来不愿意多管闲事，但到了国难临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心火在内中燃燎着，要叫我不说话自己抑厄不住。”再如1933年底，时值北大三十五年校庆，“严重的国难还依然严重”，他在《三十五年过去了》一文中，说人们只能“强为欢笑”一天，然后还得愁眉苦